

语言符号学纵横

王铭玉

(华南地区符号学科普基地、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 广州, 510545)

摘要:符号学概念最早是由索绪尔提出的, 他预见了这门学科的出现, 但无论是索绪尔, 还是皮尔斯, 由于受到时代和领域的局限, 他们都未对语言符号学作出专门的研究, 虽然世界符号学界零星涉及此问题, 但语言符号学的体系性成果始终未见。真正对语言符号学这个大厦起到基础构建作用的无疑是中国学者的系列研究。本文从历时与共时两个维度探讨语言符号学的学科脉络, 采用由远及近的方法梳理了符号概念、符号学的由来、符号学的边界、语言学与符号学的联姻、语言符号学的研究对象、符号学的显要特征和基础构建、中国语言符号学的贡献及其符号学第四王国的兴起等问题。语言符号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 旨在研究语言符号以及运用符号学的方法研究语言学, 其建立时间不长, 尚需我们共同探究与维护。

关键词:语言学; 符号学; 语言符号学

[中国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21-(2023)02-0005-22

[doi 编码] 10.3969/j.issn.1674-8921.2023.02.001

符号学在 20 世纪上半叶并不被人看好, 许多人甚至称其为“玄学”, 但时至今日, 境况大有改观, 符号学受到诸多学科青睐, 特别是“语言符号学”这门交叉学科, 基于语言的生命力和符号的表现力的研究, 已经成为大家喜爱的“显学”之一。那么究竟什么是语言符号学呢? 下文将大致勾勒出其发展脉络。

0. 引言

认识语言符号学首先应从符号概念谈起。20 世纪德国哲学家卡西尔(2004:38)在《人论》中明确指出, 从人类文化的角度来看, “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 可以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的确如此, 人类从远古时代起就努力寻找能帮助他们协同行动的手段, 为此人

作者简介: 王铭玉, 华南地区符号学科普基地、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符号学、普通语言学。电子邮箱: mywang2@163.com

*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翻译成就研究”(编号 22AZD006)、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项目“中央文献核心语汇多语种词典编纂和数据库开发”(编号 KYD19027)和天津市教委 2022 社科重大项目“语言符号学的推广与应用”(编号 2022-19)的阶段性成果。

引用信息: 王铭玉. 2023. 语言符号学纵横[J]. 当代外语研究(2): 5-25, 105.

类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就想出了交换各种符号的方法。初民最先使用的是手势、表情、含糊不清的叫声等最简单的符号,然后依次出现了口头言语和书面语。由于符号媒质的介入,人类对外界刺激就不再是本能的、被动的反应,而是积极的、自觉的、主动的反应。符号系统可以把人从已有的情景中解放出来,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主动地进行思考,延迟做出反应。这样一来,人就不仅可以根据经验和直接需要来生活,还可以根据想象与希望来生活。借助于符号系统,转瞬即逝的感觉印象被组织化和条理化,思维中的操作才有依托,才能在操作中渗入以往的经验和对未来的想象(王铭玉 2004:4)。无论从整个人类的文化进化,还是从个体的成长来看,能够意识到任何事物不仅是自身还可以是潜在的符号,符号所代表的是不同于本身的他物含义,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可以说,人类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才自觉地摆脱了实物性操作的束缚,进展到用符号思维的符号操作(同上:3-4)。

那么,究竟什么是符号呢?古往今来,众多学者对符号给出了各自不同的定义。古罗马哲学家圣·奥古斯丁认为,符号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我们想到在这个东西加诸感觉的印象之外的某种东西。美国哲学家、符号学家皮尔斯认为符号是在某些方面或某种能力上相对于某人而代表某物的东西。美国哲学家、符号学家莫里斯认为一个符号代表它以外的某个事物,并从行为科学的角度,对符号作出更为精确的表述。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建议将每种事物都界定为符号,它们依据事先确立的社会规范可以被视为代表其他某物的某物。法国符号学家巴特对符号的看法较为特殊,他认为自有社会以来,对实物的任何使用都会变为这种使用的符号。日本符号学家池上嘉彦认为,当某事物作为另一事物的替代而代表另一事物时,它的功能被称之为“符号功能”,承担这种功能的事物即被称之为“符号”。苏联语言符号学家季诺维耶夫认为符号是处于特殊关系中的事物,其中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思想的东西,因而符号的意义并不表现在它本身上,而是在符号之外。苏联心理学家列昂季耶夫认为,符号既不是真实的事物,也不是现实的形象,而是概括了该事物功能特征的一种模式。

由此可见,符号的定义是多种多样的,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定义符号时虽关注的角度并不相同,但总体而言大同小异。我们认为,所谓符号,是指对等的共有信息的物质载体。符号成其为符号,必然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重要特征:

其一,符号具有物质性。任何符号只有是一种物质符号或物质化符号,才能作为信息的载体被人所感知,为人的感官所接受。当然,物质符号可以有声符号,如古战场上的击鼓与鸣金、欢迎国宾时的礼炮、各种有声语言等;物质符号也可以是光学符号,如各种体系的文字、手势语、哑语以及各种书面语言的替代符号(数码、电报、速记、信号、标记、公式等)。

其二,符号具有替代性。任何符号都能传递一种本质上不同于载体本身的信息,替代或代表其他东西,从而使自身更充分地展开,否则就没有意义,不成

为符号。这种新的信息可能是另外的事物或抽象的概念,如用镰刀和锤子表示工农政党力量,用V字形代表胜利。这样就可以用符号代替看不见、听不到的事物、思想,从而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使抽象的概念能以具体事物作为依托。

其三,符号具有约定性,传递一种共有信息。符号是人类彼此之间的一种约定,只有当它为社会所共有并传递某种共有信息时,它才能代表其他事物。至于约定的范围,可以是全人类的,也可以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一个团体或仅限于两个人之间;这种约定的时效,则可以通过继承人、中继人的传递,跨越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

其四,符号具有对等性。任何符号都由符号形式与符号内容构成,形式与内容之间是“对等”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形式与内容不是前后相随,而是联合起来,同时呈现给人们。以一束梅花为例,梅花可以用来表示坚贞,此时的这束梅花就是符号形式,坚贞就是符号内容,梅花当然不等于坚贞,用梅花表示坚贞,绝不能解释为先有梅花,而后引起坚贞,恰恰相反,两者被联合起来,同时呈现给人们。符号形式与符号内容之间对等、联合、同时呈现的关系,就使这束梅花变成了一个符号(王铭玉 2004:14-15)。

1. 从符号到符号学

从符号到符号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符号一词,一说出自古希腊语 *semeion*,该词的词义与医学有关。据说,当时人们认为各种病症都是符号。医生诊病时,只要掌握这些符号,便可推断出病因。因此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被公认为“符号学之父”。二说源于拉丁语 *signum*,产生于印欧语系中的词根 *sekw-*(跟随),意为记号、符号、印记等。对符号问题的研究最早始于哲学领域,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曾论及符号问题。在柏拉图的各种对话录中就包括一些有关语词和符号问题的片段,如《克拉底鲁篇》就反映了关于事物与名称之间相互关系问题的争论。这里柏拉图介绍了两派观点,一派认为名称是由事物的本质决定的,另一派则认为是约定俗成的结果。例如,赫拉克利特认为,词是大自然创造的,他的学生克拉底鲁说,每一个事物大自然都赋予它一个专门的名字,就像把专门的知觉赋予每一个被感知的物体一样。德谟克利特则持相反观点,认为词和事物之间没有“自然的”联系,名称是根据人们的习惯规定的,并根据现实中存在的同音词、同义词以及专有名词的改名现象来论证自己的看法。

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也探讨了语言符号问题。他在《诗学》《修辞学》中提出区分有意义符号和无意义符号的主张。在其逻辑著作《工具论》中以较大篇幅讨论语言问题,例如《范畴篇》讨论了同音异义词、同义词、引申词以及各种范畴问题;《解释篇》讨论名词、动词、句子的定义以及各种命题之间的关系等。后人是这样评价亚里士多德在语言符号问题上的贡献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逻辑中分析了语言形式,分析了与它们的内容无关的判断和推理的形式结构。这样,他所达到的抽象和准确的程度,是希腊哲学在他之前所未

曾知道的,他对我们的思想方法的阐明和建立思想方法的秩序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实际上创造了科学语言的基础。”(肖峰 1989:13)

亚里士多德之后,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以及怀疑论者都在各自的学科中,对符号问题作过大量的描述性研究,如斯多葛学派明确指出要区分对象、符号、意义三者的不同。他们主张对象和符号都是可感知的具体存在物,而意义则是纯主观性的东西(苟志效 2004:108-113)。伊壁鸠鲁学派的《论符号》也是这方面的专著。

罗马时期对符号的讨论主要是在修辞学框架内进行的。这一时期符号研究的特点是偏于技术性和科学性。李幼蒸先生(1999:65)指出,这一倾向正是自然科学逻辑的前身。当罗马时代修辞学和记号逻辑学与基督教神学结合后,对符号的讨论大幅度转向语义学方向。中世纪前期,奥古斯丁在符号方面的研究对后人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他认为“符号(signum)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我们想到这个东西加之于感觉而产生的印象之外的某种东西”(何欣 1999:172)。由此可知,符号既是物质对象,也是心理效果。李幼蒸先生(1999:67)指出,这一区分直接影响了索绪尔的符号观。虽然奥古斯丁的绝对真理论、信仰论、善恶论和认识论在现代西方思想界均为批评的对象,但是他的思想方式对于符号学思想的进步却具有特殊意义。他在向内思考的过程中,对心理对象和价值对象意义关系问题,首次做了较彻底的探讨,并第一次将语言问题与时间意指问题相连。

在经院哲学时期,一些学者围绕唯名论与唯实论展开了争论,语词符号问题便成为两派关注的焦点之一。唯实论者认为,名称即一般概念都是实在的、客观的,并且是先于物质的,先于事物的思想是神的内在语言。唯名论则认为,只有具有独特品质的事物才是实在的,名称是事物的一般概念,作为事物的概念永远产生于事物之后。例如唯名论者奥卡姆认为,存在于人心之外的是个别事物,存在于“心灵和语词中”的是关于这些事物的“符号”,不能把它们看作是在个体之外或先于个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东西。这里唯名论对符号与事物的关系作出了本体论上的正确回答。

在近代西方思想史上,培根、洛克、霍布斯、贝克莱、莱布尼茨等人都曾论及符号问题。这些成果中较为突出的当推洛克和莱布尼茨。洛克在其著名的《人类理解论》中将人类知识分为自然学、伦理学和符号学三类,并用了专门一卷共11章的篇幅论述作为符号的语词,对语言符号的本性进行了分析,对语言符号的类型及其与不同类型观念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阐发,还对语言文字的缺陷及其滥用进行了论述。尤其是他提出的关于符号意义的“观念论”,时至今日仍然是欧美分析哲学十分关注的意义论研究的先导。洛克之所以对语言问题如此关心,是因为他认识到在深入考察认识论问题时,必然要涉及符号问题。

继洛克之后,莱布尼茨也对符号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一方面,他在《人类理智新论》中用同样的篇幅逐章逐节地对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的观点一一进

行了反驳。另一方面,莱布尼茨还潜心于数理逻辑的开创性研究,力图创造一种比自然语言更精确、更合理的通用语言,将其引入逻辑推理中,从而消除自然语言的局限性和不规则性。因此,莱布尼茨被公认为数理逻辑的创始人,这也是他在符号研究领域的一个突破性贡献。

莱布尼茨之后,康德在他的《实用人类学》中提出了符号的分类这一课题。按照康德的观点,符号可以划分为艺术符号、自然符号和奇迹符号。康德对这几类符号进行了详尽的探讨。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则认为,建筑是用建筑材料造成的一种象征性符号,诗是用声音造成的一种起暗示作用的符号。

2. 我国古代对符号现象的思考

符号学思想并非西方文化所独有,我国对符号现象的关注也由来已久。春秋战国时期各派哲学家围绕“名实之争”所形成的名辩思潮,是中国哲学史上对符号问题进行哲学探讨的高峰时期。当时,一些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几乎都参与了名实之争,从各自的立场和观点提出了所谓“正名”的要求。这里的名就是名称,与今天的“符号”在意义上大致相同。对“名实关系”的争论往往成为对于概念与事物(即思想与存在)的关系的争论,成为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肖峰 1989:8)。孔子是最先提出“正名”主张的。当时旧制度(礼)正加速崩溃,“实”越来越不符合周礼之“名”,出现了“名”存“实”亡或“名”存“实”变的局面。孔子认为“实”的变化是不应该的,因而要用“名”去纠正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的“实”。孔子的“正名”观点实际上带有较浓重的政治和社会伦理色彩。

参与“名实”讨论的先秦诸子中能够称得上“名”家(即符号学家)的有邓析、尹文、惠施和公孙龙。其中对“名”的问题讨论得最深入的当属公孙龙,他的许多著作中包含有丰富的符号学思想。李先焜先生(1993:62)认为其著作的价值不亚于某些古希腊符号学家的著作。公孙龙在著名的《名实论》中将“名”定义为“实谓”,也就是说,名是对实的称谓或指谓。换言之,名就是表述、称谓事物的名称,也就是一种符号。公孙龙认为,名的使用也存在一个行不行、可不可、当不当的问题。如果一个符号只能称谓某个特定的对象,这样使用名是可行的,反之则不可行。用今天的话说,公孙龙所谓的“名正”,就是要求“名”的精确性。“名”必须与“实”相符的这个观点体现了一定的唯物主义因素。但是,名实如何相符呢?在公孙龙看来,不是以实来正名,而是用名来纠实。这样他又倒向了唯心主义一边。

对名实关系做出唯物主义阐发的首推后期墨家。《墨经》首先肯定“实”是第一性的,“名”是第二性的,名说明实,主张以名举实,要求所运用的名词概念必须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墨经》还把名分为“达、类、私”三类。达名是最高的类概念或名词,如“物”这个词,包括了所有的物;类名是一般的类概念或名词,如“马”,所有的马都包括在“马”这个词里;私名是指个别事物的概念或名词,专指某一事物,相当于专名。

荀子在名实关系问题上以及在符号的其他一般问题上,做出了相当深刻的分析。他积极参加当时的名辩争论,并建立起了自己的正名论逻辑思想体系。他首先提出了正名的必要性,认为人们在交流思想、区别事物时,必须有适当的名词概念作为工具,否则会造成语言和思想上的隔阂和混乱,分不清事物之间的贵贱同异等差别,因此必须使名实相符。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荀子关于名词“约定俗成”的思想,即什么名代表什么实,并非一开始就是固定的,而是“约定俗成”的,是人们在长期交流思想的习惯中形成的;而一经约定,习俗已成,什么名指什么实,什么实用什么名,就能为社会成员所接受和通晓,这时名就不是个人所能任意改动的了。荀子对名实关系的精辟阐述,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在对符号本质的认识上所达到的最高水平。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祖先早在东周时期便开始了对汉民族独特的语言符号系统,即汉语、汉字的研究,并在两汉时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产生了《说文解字》这部解释古汉语文字的不朽之作。从现代符号学观点看,《说文解字》蕴藏着丰厚的符号学思想,把汉字作为一个符号系统来理解和阐释是其语言文字思想的核心。《说文解字·叙》是许慎的汉字符号学理论纲领,其中对汉字的符号性质、汉字符号的来源与演变、汉字的形体结构特点及其发展变化、字形与字义的关系以及构字写词的方法与条例等都有明确的阐述。由此可见,符号尤其是语言文字符号的重要特征和意义,也早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先哲们所认识。

3. 符号学及其边界

从现代符号学的角度看,符号学作为一门科学,主要还是西方学术思想的产物。符号学通常有 Semiotics 和 Semiology 这两种表示法,前者是皮尔斯在 19 世纪 60 年代提出来,后者则源于索绪尔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提出的 Sémiologie。二者在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和理论随之成为现代符号学思想发展的源头。

皮尔斯和索绪尔先后独立提出了符号学的构想,他们各自不同的哲学和文化背景使其在符号学术语的使用、符号学基本概念的理解方面处于对立状态。索绪尔(1996:37-38)设想的符号学是“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管它叫符号学。它将告诉我们,符号是由什么构成的,受什么规律支配。因为这门科学还不存在,我们说不出它将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它有存在的权利,它的地位是预先确定了的。语言学不过是这门一般科学的一部分,将来符号学发现的规律也可以应用于语言学,所以后者将属于全部人文事实中一个非常确定的领域”。皮尔斯理解的符号学是“关于潜在符号化过程所具有的根本性质及其基础变体的学问”,这里的符号化过程是指“一种行为,一种影响,它相当于或包括三项主体的合作,诸如符号、客体及其解释因素,这种三相影响,无论如何,不能分解为偶对因素之间的行为”(艾柯 1990:17)。皮尔斯甚至认为逻辑学也不过是符号学的

另一种说法而已。显然,索绪尔注重符号的社会功能和语言功能,而皮尔斯注重符号的逻辑功能。

索绪尔的符号学定义认为能指和所指间的关系奠定在规则系统的基础上,这种规则系统相当于“语言”,换言之,一般认为索绪尔大体上只把背后有明确代码的符号体系看作符号学的对象,就此而言,索绪尔的符号学似乎是一种刻板的意指符号学。然而,将符号学视为交流理论的人基本上仰仗索绪尔的语言学,这一点绝非偶然。那些赞同索绪尔符号学概念的人,严格区分开有意图的人工措施(他们称之为“符号”)和其他自然或无意的表现形式,后者严格讲不配这样一种名称。皮尔斯认为,符号就是“在某些方面或某种能力上相对于某人而代表某物的东西”(同上),与索绪尔不同的是,作为符号定义的组成部分,它并不要求具备有意发送和人为产生的属性。通常认为索绪尔的符号学定义看重符号的社会性,而皮尔斯则看重符号一般意义的逻辑(乐眉云 1994:15)。按照穆南的说法,索绪尔的符号学是以基于代码的传达为对象的“传达符号学”,皮尔斯的符号学则是以语义作用本身为对象的“语义作用符号学”,而“有效的传达”和“创造性的语义作用”被认为是语言符号两个方面的典型特征。乌斯宾斯基认为,索绪尔和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体系分别归属于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的符号学(семиотика языка как знаковой системы)和符号的符号学(семиотика знака),两者确定了符号学的两个主流方向,即语言学方向和逻辑学方向。

由于对“什么是符号学”这一本源性问题的模糊认识,符号学在现阶段正承受着本体论上的巨大压力。综观符号学家的研究,符号学几乎渗透到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斯捷潘诺夫(Степанов 1983:5)指出:“符号学的对象遍布各处:语言、数学、文学、个别文学作品、建筑学、住房设计、家庭组织、无意识过程、动物交际和植物生命中,”而研究对象的无限扩张对于一门学科来说是一种致命的打击。在这方面,美国逻辑学家和符号学家莫里斯认为符号学是关于所有符号的科学,认为符号学不仅提供了一种丰富的语言来统一关于某个主题领域的知识,而该领域的现象一直是多种特殊的学科片面地加以研究的;它还提供了一种工具来分析所有特殊科学的语言之间的关系。在此意义上,莫里斯甚至赋予了符号学以统一科学的使命,认为符号学既是科学统一中的一个方面,又是描述和推进科学统一的工具(莫里斯 1989:268-269)。艾柯基于一般符号学立场,指出符号学所关心的是可以视为符号(即从能指角度替代他物的东西)的万事万物,并根据符号学所涉对象的广泛性确定了符号学研究的政治疆界、自然疆界和认识论疆界,符号学研究因而面向整个社会文化领域、自然现象领域和人类思维领域。这样看来,由于我们在社会生活最为广泛的领域,在认知过程、技术研究、国民经济,甚至在生物界的现象中都能接触到符号系统,因此符号学的对象及其作用的范围是足够宽泛的。对于这种现象,尼基京(Никитин 1997:3)不无忧虑地指出:“符号学试图将下述所有

领域都扣上符号性的帽子:心理学和心理分析,精神病学和性学理论,知觉、暗示、愉悦理论;女权论和男性化理论;个性、交往和个体相互作用理论,交际理论和意义理论;通灵术和占卜术(意识形态、神话学和宗教),语言学,文学批评,艺术理论(电影、戏剧、绘画、音乐等),诗学,结构主义,相对主义,形式主义,象征主义和其他一般性或个别性的不同层级上的诸多现象……以此各不相同的广阔领域为学科覆盖的范围,符号学的意义最终只能归于使用能指和所指的术语来对所有这些现象进行无谓的范畴化。”正是看到了符号学理论繁多而学科地位不明的现状,杰米扬延科指出,一方面对符号学对象研究的态度多样性,另一方面符号本身的多面性是理论多样性和繁杂性的原因。要想避免这种繁杂性的局面,只有进一步弄清符号学科学的特征,它在学科体系中的位置及其理论基础。

虽然也有学者试图为符号学建立合理的边界,为其作为一门正式学科的地位正名,但到目前为止,这些努力收效甚微。莫里斯认为,符号在符号系统中的生命是由三个向度决定的:符号体是如何构成的以及由何种实体表现;意思指的是什么;最后产生了何种影响(符号的使用引起了什么样的效果)。莫里斯认为存在着关于符号的完整科学,它有着清晰确定的研究范围。但事实上,莫里斯将所有的符号均纳入符号学的疆域,而不管它是动物的或人的、语言的或非语言的、真的或假的、恰当的或不恰当的、健康的或病态的。此外,他看到了符号学对于科学知识的统一(系统化)的重要性,甚至试图赋予符号学以统一科学的使命。因此,我们很难说他已达到了清晰界定符号学研究范围的目标。艾柯把符号定义为基于业已成立的社会习惯,能够解释为代替其他东西的所有东西,认为符号学与其说有自己的对象,不如说具有自己的研究领域;符号学的中心问题是符号关系、符号替代某种其他事物的能力,因为这与交际和认知的认识论密切相关。他认为,符号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各个领域内使用的符号系统,它研究这些符号系统构成和使用的共性规律以及为解决确定的认知和实践任务而编制人工符号系统的途径和方法。列兹尼科夫从认识论角度出发,认为(一般)符号学的实际任务应包括符号的本质,符号在认知和交际过程中的角色、符号的种类、符号与意义、符号与事物、符号与形象间的相互关系、语言符号的特点、符号在科学知识形式化过程中的作用等。苏联科学院控制论学术委员会的符号学研究室致力于从控制论和信息论角度为符号学研究设定清晰的边界,其理解的符号学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为数字机器创建抽象的程序语言;构建、研究和运用科学和技术的人工语言;研究从一种自然语言到另一种自然语言的机器翻译问题;研究作为符号系统的自然语言,特别是数理语言学和结构语言学。很显然,符号学的这些分支方向除了表现出莫斯科学派一贯的科学传统外,符号学的边界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人工语言的无限广泛性是不言而喻的。面对这一状况,尼基京把符号学视为有关符号和符号系统、符号系统的功能和相互作用、事物和事件符号化及其意义规约化和词典化的科学,

并从寻找符号的科学定义入手来限定符号学的疆域。他认为符号应包括三个方面的构件,即意图(интенция)、发出者(отправитель)以及从发出者到接收者规约性的意义转换器(конвенциональный транслятор значения от отправителя к получателю),三者缺一不可。即便这样,符号和符号学的范围仍然广大得无法把握。

与此同时,许多研究者认为,作为一种研究方向的符号学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思维风格,一种能够提出并解决问题的方法。例如斯捷潘诺夫(Степанов 2001:15)就认为:“符号学路径(сем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одход)的特点更多地体现在方法上,而不是对象上。”事实上,尽管符号学边界问题时至今日仍然是一个无法精确把握的问题,但符号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彰显出独特的魅力,在各个学科的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文学批评、建筑、音乐、电影、民俗文化等;“无论是在以科学性为己任的结构主义这条线索中,还是在唤起读者的阐释主体意识为特征的现象学、阐释学和接受美学这一线索中,甚至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生产理论这条线索中,符号学都可以作为一门无所不及的边缘学科扮演其他学派所无法扮演的角色”(王宁 1995:137),将符号学的一般原理应用于各个具体的符号域研究中,产生了语言符号学、社会符号学、法律符号学、电影符号学、音乐符号学、宗教符号学、心理符号学、建筑符号学、服装符号学、广告符号学等多个部门符号学,显示出应用符号学研究的勃勃生机。20世纪70年代,格雷马斯在语义学和叙事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将符号学作为人文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的宏伟构想。

针对这种情况,李幼蒸教授(1999:3)指出:“符号学作为专门科学领域的较弱地位和符号学作为人文科学分析方法的较高功效间的对比,不仅反映了符号学本身的内在学术张力的存在,而且反映了它所从属的人文科学全体构成的特点,从学术思想史上看,符号学也有着类似的处境,学科身份的不明与实质影响的深刻互不一致。”认识到了符号学对于科学的双重身份之后,莫里斯强调:“如果符号学——它研究那些起着符号作用的事物或事物的性质——是一门和其他的诸科学并列的科学,那么,符号学也是所有科学的工具,因为每一门科学都要应用指号并且通过指号来表达它的研究成果。因此,元科学(关于科学的科学)必须应用符号学作为一种工具科学。”(杨习良 1993:23)

4. 语言学与符号学的联系

语言学与符号学的特殊关系注定了二者的联姻,语言符号学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从索绪尔提出符号学的构想,皮尔斯建立符号学体系开始,语言学与符号学就具有天然的联系。具体可从两个侧面谈起:

第一,源自索绪尔的欧洲符号学传统一直强调语言学对符号学的影响。理由是语言学作为其他科学的研究模式,是符号学领域中研究得最为充分、最为完善的部分;一些语言学概念,如系统、句法、语义、区别性对立等在其他学科领

域中的运用获得程度不同的成功;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言充当着其他符号系统解释者的角色。叶尔姆斯列夫提出了语言的“可译性”特征,即语言是一种能够翻译它以外的一切符号体系的符号体系;雅各布森也强调语言在符号系统中的中心地位,进而将语言学的方法成功地应用于诗学研究领域;巴特甚至认为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俄罗斯符号学界的传统看法是将语言符号视为第一模式系统,而将其他符号,如宗教、文学、艺术、建筑等视为第二模式系统,第一模式系统起着解释第二模式系统的作用。

第二,符号学作为一般认识论和方法论科学,对语言学也施加着毋庸置疑的影响。首先,符号学推动语言学研究地位的改变,即实现从边缘学科向主导学科的转变,在这方面,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观、价值观、结构观等思想均源自其将语言视为一种符号系统这一理论出发点,而他提出的将语言学纳入更为广阔的学科环境以摆脱封闭性的任务实际上已经完成。其次,符号学研究的对象是本体(符号+符号)、客体(符号+所指)和主体(符号+使用者),这深刻反映了主、客观世界的本质;另一方面,研究对象的共有性使其与语言学的三个最重要前沿学科——句法学、语义学以及语用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再则,对待语言的符号学态度使得人们开始关注语言单位的符号特征,这对于摆脱将符号同其所意指的现实隔裂开来的唯心主义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克服了将符号与其所指等同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倾向。语言学问题由此得到了哲学上的本体论阐释,更为重要的是,意义问题终于获得了其在语言研究中应有的地位。另则,符号学跨学科的本质特点促进了语言同人类生活其他现象的比较研究。符号学为语言学者将其他知识领域的素材,特别是民族学、文学、考古学等与文化相关的材料纳入研究的跨学科态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这一点上,符号学提供了研究不同现象的统一的理论和方法基础。最后,语言学研究的符号学方向纠正了将语言视为名称表的错误观点,促使研究者对语言个别单位和语言整体的功能给予足够的重视。

由此看来,符号学是以符号系统为载体、以探求意义为主旨的阐释性科学。如果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符号学,后者是以人类使用语言及其他符号系统进行表义和信息传递的过程为学科外延,从而全面揭示人的符号动物本质的学科。符号学的方法论威力和普适性已经在众多学科和交叉学科中得到了验证,符号学是一种跨学科的方法论已经是学界无可争议的事实,从文化符号学、历史符号学、社会符号学、建筑符号学、音乐符号学等交叉应用学科的问世就能看出符号学的显学地位。总之,语言学和符号学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互动和互融的基础早已存在,语言学与符号学的特殊关系注定了二者的联姻,尽管这一过程不像索绪尔期望的那样顺利,而是发生在符号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半个世纪之后,但它毕竟在人们的期待之中诞生了,并且当前学术界的动向已经彰显出其重要性和发展趋势。

5. 语言符号学的研究对象

语言符号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符号。语言符号学是语言学与符号学内在发展要求的必然产物,其出发点是用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语言,为语言学提供新的方法论视角和理论支撑。语言符号学汲取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与信息的编码、传递、解码以及语义等问题相关的理论与思想,如控制论、信息论、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从而发展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

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语言符号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更确切地说,是语言符号。在语言符号学的学理框架内,语言是一个表意的层级符号系统。语言符号学采用双重意义学派的符号观,融合了现象学派和逻辑心理学派关于符号物质性和思想性的观点,认为符号具有物质性,并且能传递一种本质上不同于载体本身的社会信息,从而提升了符号概念的科学性和适用性。

语言符号是符号众多种类中的一种,在皮尔斯的符号分类中被广为接受的是象似符、索引符和象征符,语言符号被归为象征符的下类。《语言符号学》一书则按照指谓关系把符号概括为五大类,即征兆符号、象征符号、信号符号、语言符号和替代符号,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皮尔斯的传统观点。

以往的符号学研究因为研究对象的不甚明晰和研究界限的过于宽泛而被人批评为“符号帝国主义”。语言符号学不会受到该问题的困扰,它的宗旨是实现符号学与语言学的真正合流,把语言符号系统视为其他所有符号系统的母版和元系统,发挥元符号系统的释义作用。为了确定语言符号学的合法性,推动其作为独立学科的建立,就需要发展一整套具有批判意识的、科学的、完备的语言符号学理论。事实上,语言是人类创造的最强有力的符号系统,体现在其复杂性、精密性、系统性、层级性、第一性、通用性、能产性、线条性、演化性等方面,因此,语言符号系统毫无疑问地占据着符号学研究最重要的阵地。语言符号学把抽象的语言总体作为一种元符号系统,从最一般的意义上对语言进行阐释,如社会属性、功能、遵循的律则等,从而为研究其他符号系统,如艺术符号、自然符号、服装、礼仪、家具等,提供根本性的参照,从符号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解释,如系统性、层级性、代码性。

6. 语言符号学的显著特征

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语言符号学具有如下显著特征:

第一,把符号视为人的本质所在。人是符号的动物,与人有关的一切甚或是整个人类世界都与符号紧密关联,人的符号本质要求我们必须要从符号的角度思考人的全部意义,这就是人们常把符号看作人类的交际工具,把符号学视为方法论的原因。第二,语言符号系统是所有符号系统的原型或母版,一切符号的解释都需要借助语言,或言说的语言或书写的语言。以语言符号为核心内容辐射非语言符号,从而可以充分发展应用符号学的分析方法与理论。语言符

号学把语言理解为人使用符号动态的建构意义、赋予世界以文化秩序的过程,从而突破了仅把语言视为描述世界和表达思维工具的窠臼。第三,整合语言学、符号学、哲学等学科中的相关思想是语言符号学作为交叉学科发展的基础与前提。符号学独立之前属于哲学的研究范围,符号学的许多思想理论就是哲学的研究内容,如萨特的现象学、卡西尔的人类文化哲学、康德的先验主义哲学等,只有厘清了这三个学科的联系与区别,才能把握语言符号学的内在发展脉络,探明学科的发展方向。第四,为文化研究提供启示。文化在本质上就是符号的组合方式和编码结果,人的知觉意义、认识经由符号的组合与聚合排列而得以表现和传达,文字符号系统的存在不仅是对言说的语音系统的简单记录,不只是防止遗忘对记忆的侵蚀,除了沟通交际这一重要的工具作用之外,我们应该看到它还有建构文化秩序与社会秩序的作用。语言符号学不仅要解决同质文化内意义的产生与传递问题,还应考虑异质文化和跨符号系统境况下的意义理解问题。第五,注重应用研究。符号学的方法论不应该只是口号,还应该能对我们的生活世界做出更合理的解释。如法国符号学家巴尔特对服装和食品的符号学分析,澳大利亚语言学家韩礼德语法隐喻理论中对符号能指与所指理论的借用,借助符号层级理论对隐喻意义解读等。第六,描写与操作结合。语言符号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在研究的方法上不局限于描写,如法国符号学家格雷马斯对公式图表的大量运用、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的逻辑分析等。语言符号学应同时注重描写和对可操作性规律的总结,把握好对数学和逻辑表述应用的度。第七,从能指与所指出发,在动态性的符号化过程中阐释意义的生成与理解。语言符号学是以探究意义为宗旨的,试图为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科提供解读符号意义的途径与视角,但语言符号学对意义仍然只是一种尝试,要避免符号学对意义的阐释垄断。

7. 语言符号学的理论创新

语言符号学的基础构建是学科发展的关键,它是一种理论创新。符号学概念最早是由索绪尔提出的,他预示了这门学科的出现,但无论是索绪尔,还是皮尔斯,由于受到时代和领域的局限,他们都未对语言符号学作出专门的研究,而在世界符号学界,虽然不时涉及此问题,但语言符号学的体系性成果始终未见。真正对语言符号学这幢大厦起到基础构建作用的无疑是中国学者的系列研究。

一是《语言符号学》。这是国内外首部中国学者有关语言符号学的研究专著,是世界语言符号学领域的奠基之作,也是中国符号学理论研究的集成反映。全书就该学科的基本概念、理论基础、核心要素以及中国符号学的思想理论作出了创造性阐释,尝试构建一个科学的语言符号学学科框架。全书50余万字,2004年书稿第一版被高等教育出版社收入首批“中国外语知名学者文库”出版。在此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出版社已五次印刷。鉴于该书的良好口碑及学术影响,2015年和2017年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两次出版。2017年获国家社科基金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2021年英文版在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正式在国外出版发行。该书的学术价值在于:第一,提出重要的学术发现,历史上首次把语言符号学作为一个完整学科进行论证,开辟了一个用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语言学问题的崭新视角;第二,提出独到的理论观点,分别就语言符号学的12个核心要素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中国符号学13个方面的理论依归和中国符号学6个方面的学术精神,关切符号学在中国的发展进路;第三,提出并验证新的模式和方法,运用交叉学科模式将符号学与语言学进行深度整合研究,打破碎片化方式,首次对学科进行了系统研究。该书既有概念的界定,又有学源的梳理;既有核心要素的确立,又有理论框架的构建;既有历史的回顾,又有发展的展望,为语言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二是《现代语言符号学》。该书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于2013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现代语言符号学》是对《语言符号学》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如果把《语言符号学》看作是创建语言符号学的基础理论篇,那么《现代语言符号学》就是提升该项研究的理论实践篇,二者相互联系、前后相承,可以看作是语言符号学研究的姊妹篇。该书全面回顾了现代语言符号学的思想渊源,论及最能代表符号学观点的理论思想,如符号系统观与语言符号观、符号的三位一体与分类、符号学的三个世界与论域类型、符号的二元分析与多元解读、符号的代码理论及生产理论、符号的功能系统与双向模式、符号的性质及对话理论、模式系统与符号域等,除了历史梳理,还立足语言层级思想,分别对篇章符号学研究、句子符号学研究、隐喻符号学研究展开了自上而下的研究探索,从符号学视角解读语言的本体,真正实现了用符号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语言,为语言符号学从学理上找到了本体论的依托。与《语言符号学》一书相比,书名上多了“现代”二字,其意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研究目的。现代之作应面对现代问题,先前的研究多在基础理论上下功夫,而该书追求在理论的指导下去分析解决当下语言符号面临的具体问题,为语言符号学打上现代之烙印。

第二,研究途径。思维科学告诉我们,有序的客观世界是以它的层次性为突出特征的,而系统的层次问题是现代语言符号学中头等重要的问题,该书正是从篇章符号学、句子符号学、隐喻符号学的层次来展开研究的。

第三,研究方法。符号学可以被理解为关于符号系统和符号过程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虽然其研究的边界并不十分清晰,但以共同的方法论导向为特征却是学者们所公认的(符号学在人文科学中的地位相当于数学之于自然科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它更应为语言学研究提供精确的概念体系和有效的分析工具,该书采用的结构主义态度、二元对立的尺度、常体变体的二分观念、组合聚合的二维思想、三分法的原理等均具有现代科学的方法论价值。

三是《符号学论略》。这是一本以语言符号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集,被列

入“中国当代符号学名家学术文库”，2021年由北京大学正式出版。该书由30篇相关论文集合而成，分为符号学概论、符号学理论阐释、语言符号学研究、符号学应用研究和符号学评介五个部分。全书追踪世界符号学的发展步伐，既有理论探索，又有实践分析；既有西学精华，又有东学传统；既有学术引介，又有系统创新；既有学理思想，又有趋势展望。

四是《符号学思想论》。这是一部对语言符号学思想源流进行史论分析的专著，于2021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对符号学思想进行独立和系统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时至今日，虽然国内外符号学界对主要符号学大国的符号学理论有过一些评介，但始终未有以专著形式对它们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探索的作品问世。《符号学思想论》是一本厚重的学术著作，是对古今中外符号学思想的历史梳理，是对法、美、俄、中“四大王国”几十年来符号学研究发展历程的概括总结。全书的突出特色在于：

第一，国别符号学研究。符号学作为一个与思想、文化、艺术等领域密切相关的人文学科，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具有独特的历史人文特性，产生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各个地区和国家的发展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比如，法国的符号学传统主要来自“索绪尔/格雷马斯—结构主义语言学—后结构主义”，美国的符号学传统具有综合性，其中最主要的一部分来自“皮尔斯/莫里斯—逻辑哲学—认知科学”，而俄罗斯的符号学传统主要来自“巴赫金/洛特曼—马克思主义文论—社会文化学”。对符号学进行国别研究，一方面可以厘清符号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另一方面可以吸收、借鉴各国研究的优长和特色，为符号学研究的本土化服务。

第二，符号学思想的史料性原则。该书详细梳理了法、美、俄、中符号学思想的历史发展阶段，同时又详尽列举了各国各阶段符号学界的代表人物及其理论精髓、代表作品，如索绪尔、巴特、列维-施特劳斯、格雷马斯、克里斯蒂娃、皮尔斯、莫里斯、雅各布森、西比奥克、普洛普、巴赫金、洛特曼、李幼蒸、王铭玉、赵毅衡等。书后还附有术语索引和人名索引。可以说，本书为符号学研究者提供了重要参考文献和资料，可以为高校“西方符号学思想”“中国符号学研究”“符号学思想史”“语言符号学”等课程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第三，索绪尔模式和皮尔斯模式符号学研究的继承与创新。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其自身发展中存在几种模式。其中最具普遍性的观点认为符号学存在两个模式，即索绪尔模式和皮尔斯模式。书中多处以这两位符号学奠基人的理论为例进行对比研究，指出“索绪尔是在语言学研究时萌发了符号学的思想，而皮尔斯是在进行哲学和逻辑研究的时候萌发了符号学的思想。对比两人对符号学的理解，索绪尔的符号学侧重研究符号在人类表达、交流中的社会功能，而皮尔斯符号学侧重研究符号在逻辑思维中的认知功能”；“如果说索绪尔传统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语言论符号学是一种人文的、能指本位的、形式论的符号学，那么皮尔斯符号学传统则是一种客观逻辑的、所指本位的、实体论

的符号学”(王铭玉等 2021:4)。

第四,探索符号学思想的中国特色。在中外符号学研究界,本书首次把中国古代的符号学思想与中国当代的符号学研究进行整体性的系统描述,凝练了中国符号学的独有特点和特有的研究领域、课题,指出了中国符号学发展应有的学术精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大胆地概括出中国传统符号学中隐含的执中型“中性”思想,把它概括为世界符号学的第三条路径“语象合治”,为使中国秉持“中性符号学”意指模式走向世界,成为第四大符号学王国奠定了理论基础。

8. 中国语言符号学的崛起

纵观国内符号学相关史料与文献,中国现代符号学的萌芽期应确定在民国期间,在西学东渐浪潮的推动下,中国学界逐渐自觉地建立现代学科意识,主动地引进和吸收国外语言学思想,开展相对自主的符号研究。较早关注符号学研究的是胡以鲁先生,他于 1912 年撰写《国语学草创》,阐述语言符号观、符号任意性、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关系等语言符号问题;之后有乐嗣炳先生,他于 1923 年出版了《语言学大意》,认为语言的结构由“内部底意义、外部底符号”构成;但真正提出“符号学”这个中文词的是赵元任先生,他于 1926 年在自己参与创刊的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符号学大纲》的长文,指出“符号这东西是很老的了,但拿一切的符号当一种题目来研究它的种种性质跟用法的原则,这事情还没有人做过”(吴宗济、赵新那 2002:178)。在文章中他大胆地厘定了符号之本质与界限,提出了符号学称谓 symbolics 或 symbology (或 symbolology),阐述了符号指称关系和构成要素,并试图确立符号学之研究框架。可惜,赵元任之后,此词在中文中消失几十年。“符号学”的再次出现由于政治生态问题而呈现出断续的情况,先是周熙良在 1959 年翻译的波亨斯基《论数理逻辑》中提及了符号学问题,接着是 1963 年贾彦德、吴棠在翻译的《苏联科学院文学与语言学部关于苏联语言学的迫切理论问题和发展前景的全体会议》一文中国固化了“符号学”一词,而真正把符号学当作一门单独学科来讨论的则是金克木 1963 年在《读书》第五期上发表的《谈符号学》。

中国现代符号学研究的春天始于改革开放。从彼时起到 21 世纪初,中国符号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1980~1986 年的起步阶段(发表论文约 45 篇,年均不足 7 篇)。自 80 年代初起,中国学者开始参与国际符号学学术活动,及时向国内传达、介绍国际符号学研究动态。从研究内容上看,这个阶段的研究重点是对国外符号学家主要思想的引介,对符号学基本理论的总体论述及其作为方法在文艺研究中的应用,如赵毅衡的《文学符号学》、俞建章和叶舒宪的《符号:语言与艺术》、肖峰的《从哲学看符号》、杨春时的《艺术符号与解释》等。此外,我国在这一时期也引进并翻译了一些关于符号学、语言符号学、经典文艺理论符号学

方面的著作,如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池上嘉彦的《符号学入门》、霍克斯的《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卡西尔的《人论》、朗格的《情感与形式》、巴特的《符号学美学》等。

第二阶段是 1987~1993 年的加快发展阶段(发表论文约 87 篇,年均 12 余篇)。自 1987 年起,我国的符号学研究重心逐渐发生转移:第一,从对符号学、语言与符号学基本理论的总体的、粗线条的论述转变为对符号学具体理论的更细致、更深入的分析研究,如对符号的线性、任意性的讨论和对各符号学家理论的比较研究;第二,符号学作为一门方法论及崭新的学说开始被应用于具体的语言学研究中,如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研究;第三,符号学研究开始涉及语言学以外的如文学、翻译和艺术等领域,如从符号学角度看翻译、用符号学观点来阐释文学作品的语言艺术;第四,一些学者开始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符号学思想,如对公孙龙、荀子等名家著作中符号学思想的阐释。在此阶段,具有重要影响的中国学者著作有王德胜的《科学符号学》、李幼蒸的《理论符号学导论》、杨习良的《修辞符号学》、丁尔苏的《超越本体》、苟志效的《意义与符号》、陈治安等的《论哲学的符号维度》等;译作有艾柯的《符号学理论》、巴特的《符号帝国》《神话——大众文化诠释》《符号学原理》、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方法研究》等。可以说,这一阶段的符号学研究渐成气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1988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次举办了京津地区部者参加的符号研讨会,会后,中国逻辑学会和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分别成立了符号学研究会。

第三阶段是 1994~2016 年的全面展开阶段。1994 年是个重要节点,当年 5 月在苏州大学召开了首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并成立了对中国符号学研究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标志着中国的语言符号学研究正式登场,学科构建工作拉开了大幕。我们采用“符号学”主题索引的方法对中国知网(CNKI)1994 年至 2016 年间以符号学为主题的文章进行了检索,共找到 11745 篇文章,最终确定其中的 571 篇为分析对象。首先,在共时方面,即从数据统计阶段内 CNKI 有关符号学研究的整体情况来看,在中国符号学研究中,语言文学文化符号学研究占比较高,占论文总数的三分之一。其次,在历时方面,即各个时间段分布情况来看,1994~2000 年语言符号学研究主题占比最高,为 50%;2001~2010 年符号学理论研究占比最高,为 25.33%;2011~2016 年文学文化符号学研究占比最高,为 24.40%。再则,从研究领域来看,属于语言学和文学学科的论文篇数较多,语言学方向的论文有 235 篇,占比 41.16%;文学方向的论文 169 篇,占比 29.60%。这说明,虽然符号学贯穿于各个学科之中,但中国最初对符号学感兴趣的是语言学和文学学科,尤其是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借助外语的优势高度关注语言符号学学科的构建。另外,通过对高被引文章(59 篇)的整理可以发现,其中以语言符号学研究为主题的论文篇数最多,为 16 篇,占总篇数的 27%,这说明中国符号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涉及语言符号学方面的较多。

从 2016 年开始,随着新一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理事会的成立,中国语言符号学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本土化及创新阶段。一是研究者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引进”西方理论,而是纷纷面对中国文化进行本土研究;二是由语言与符号研究走向了符号学研究之道。客观讲,最初的符号学研究主力军是一批外语学者,随着研究的深入及成员的扩大,目前,一个全方位的符号学研究态势逐渐形成;三是中国符号学者结合已有研究,开始深层思考中国的符号学地位问题,在语言符号学开始了创新之路之后,大家都在探究符号学的第三条路径问题。

中国语言符号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与学会发展的进程密切相关。1994 年 5 月 18 日~20 日“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在苏州大学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秘书处设在苏州大学,会长为胡壮麟教授。2016 年 7 月 15 日~17 日,“第十二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在东北师范大学举行,其间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召开常务理事会,选举研究会副会长、时任天津外国语大学副校长王铭玉教授为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第二任会长,苏州大学王军教授为学会秘书长,原会长胡壮麟教授被聘为名誉会长。2016 年 11 月 6 日,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正式加入中国逻辑学会,并更名为“中国逻辑学会符号学专业委员会”(英文名称: The Committee of Semiotic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Logic in China),设立《中国逻辑学会符号学专业委员会章程》。目前,学会设有会长 1 人,副会长 9 人,常务理事 20 人,秘书长、副秘书长 6 人,正式理事及会员 200 余人。会刊为《语言与符号》,系天津市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中文学术辑刊。此外,学会还拥有 *Language and Semiotic Studies*、*Chinese Semiotic Studies*、*Signs and Media*、《符号与传媒》等符号学方向学术期刊或辑刊,在国内外享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学会创办以来,每两年轮流举办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和符号学高端论坛,自 2007 年起学会每隔一年召开一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高层论坛。迄今为止,本学会共计召开了 15 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和 8 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高层论坛”。

与此同时,为了促进语言符号学研究的有效开展,2017 年 5 月 11 日,由学会倡议召开的“符号学基地建设研讨会”在西北师范大学举行,会议一致决定成立“中国符号学基地联盟”,会议签署了《中国符号学基地联盟协议书》,达成了中国符号学研究“兰州共识”。如今中国符号学基地联盟成员单位已增加到 11 家,包括南京师范大学国际符号学研究所(2017 年,以国别区域符号学研究为主)、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2017 年,以一般符号学和传播符号学研究为主)、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研究所(2017 年,以理论符号学和符号学史研究为主)、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2017 年,以语言符号学研究为主)、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符号学研究中心(2017 年,以民俗符号学和网络符号学研究为主)、同济大学语言学与多模态符号学研究所(2018

年,以多模态符号学研究为主)、上海大学-都灵大学文化符号学跨学科研究中心(2018年,以文化符号学研究为主)、安徽师范大学比较符号学研究中心(2019年,以语言符号学比较和语料库符号学研究为主)、重庆大学艾科研究所(2021年,以意大利 Umberto Eco 符号学思想研究为主)、广外南国商学院华南地区符号学科普基地(2022年,以中性符号学研究为主)、大连外国语大学国际语言与文化符号学研究中心(以国际符号学研究为主)。它们各具特色,研究互补,有力地助推了中国符号学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世界符号学尤其是语言符号学研究的中国阵营。

9. 作为第四符号学王国的中国

语言符号学的支撑后盾是其上位概念符号学,因此,对语言符号学的展望一定要放眼于符号学本身的发展。长期以来,在世界符号学界,法国、美国、俄罗斯被誉为“符号学三大王国”。法国是世界符号学研究的滥觞之地,以巴特、格雷马斯为代表的巴黎学派对符号学的启蒙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其研究有三大主要特点:一是鲜明的语言方向;二是极强的文学性倾向;三是跨学科和应用符号学研究趋向。美国是目前世界上符号学研究最活跃的国度,其研究起源于皮尔斯的符号研究、莫里斯的行为主义研究和古典语言学研究,以卡尔纳普的逻辑实证结构研究、米德的社会学研究和华生的行为心理学研究,卡西尔的象征主义研究、雅各布森带有语言符号学倾向的诗学研究、西比奥克带有生物符号学倾向的全面符号学研究等为典型代表。百年来,俄罗斯符号学则有各种专业背景、各个研究方向的学者对语言、文学、建筑、绘画、音乐、电影、戏剧、文化、历史等符号域纷繁复杂的符号/文本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索,时刻将符号学的历史对象研究与现实对象研究,将符号学一般理论研究与具体领域的应用符号学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形式主义学派、功能主义学派、莫斯科-塔尔图文学符号学等各种流派和方向,发掘出大量具有共性的符号学规律,涵盖了社会思想、民族文化、人文精神等各个方面。

从前述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对符号学进行有意识研究的历史并不算长,但伴随着国家的飞速发展,中国符号学高点起步,成果不断,一个符号学第四王国的雏形展现在世人的面前。此时,我们应该思考哪些问题,做哪些事情已然构成了中国当代符号学的首要任务。金克木(1984:237)曾说过:“为什么不可以有中国的,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符号学和诠释学研究呢?我看我们不是不具备突破西方人出不来的循环圈子的可能。20世纪的世界思潮已经显出西方大受东方的影响……21世纪为什么不可以是中国思想对世界思潮更有贡献的世纪呢?”

首先,中国符号学者应该理性融合中外。毋庸置疑,中国符号学的出现为世界人文科学合理化和现代化构想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中国符号学问题的科学意涵远远超出了一般比较文化研究的界限而扩展至符号学、哲学、人文学

术传统和世界人文科学理论等各个重要方面(李幼蒸 2001)。中国符号学的重要意义并不仅仅体现于尚处在发展阶段的中国符号学研究成果中,重要的是我们已可从上述多个相关方面分析其理论潜力。中国知识界有两大优良传统:一是学者乐于对本国学术传统进行批评性的研究,对封建时代学术成果进行科学性检讨,自“五四”以来在中国即具有当然之义,学者们勇于对本民族文化学术传统进行改造,促其进步,而非对其进行功利性的利用和膜拜;二是拥有日益丰富的西学知识的当代中国学者跳出了西方学术中心主义的历史樊篱,从而能够更加客观有效地对西方人文学术思想进行批评性研究,并参与和促进其变革。符号学作为意识形态色彩最少的语义结构和学术制度的分析工具,在创造性的比较学术研究中将会发挥有力的推动作用,而中国符号学在新的世界学术格局中将会成为世界新人文知识的客观评价者、共同组织者和认真推动者。沿着跨学科和跨文化方向,既有对西方学术资源更加广泛深入的学习和研究,又有对本国学术遗产的更富科学性的探讨。中国符号学的努力虽然只是学术世界的一小部分,但由于其特殊的观察角度和知识背景,将在世界人文科学结构调整的全球事业中,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其次,我们要对中国人文学术传统充满自信。李幼蒸先生(2001:49)早就提出:“西方人文科学的主流和理论方向绝对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理论一般也被认为是研究非西方人文学术的方法论基础。然而,在人文学术跨学科发展的新时代,未来世界人文科学整合与合理化的趋势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将西方理论直接扩充应用于一切非西方学术界。非西方人文科学传统,特别是内容丰富和历史悠久的中国人文学术传统,将在全球人文科学交流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和独立批评的角色。”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符号学学术资源独特、丰富,像易学符号资源、名学符号资源、训诂学符号资源、汉字符号资源、术数符号资源、音韵符号资源、人类学符号资源等都对世界符号学具有重要的价值,它们在比较文化研究中的不可替代性已渐趋明显。因此,就理论层次的研究而言,在一些当代重要的人文学科领域里,中国学术的积极参与将有可能从实质上改变人类人文科学(当然包括符号学)整体的构成。当然,中国人文学术传统参与世界学术交流,并不是指将中国传统人文学术机械地纳入现代人文科学理论系统,而是指在中国学术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之后,有关学术理论将不可避免地发生相应的变化或调整。在此同一过程中,中国传统学术也会自然而然地经受现代化的变革。

再次,只有中国学者才能担起中国符号学研究的大任。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者开始对符号学发生兴趣,这充分反映了新一代中国学者,特别是从事中国古典符号学研究的学者热心追求人文科学现代化、理论化和科学化的兴趣。与此同时,国外学者有关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先天知识不足,造成了西方的中国文史哲研究,尤其是中国符号学研究难以提升到现代化层次的历史社会性原因。反之,中国学者在过去三四十年来对现代西方文史哲理论的了解日

益深入,加上他们在掌握本国文史哲知识上具有的先天优势,今后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现代化的工作将必然以中国为中心。同理,中国符号学研究自然也会首先兴起于中国,而非兴起于一般来说学术较先进的西方。与西方的中国符号学研究不同,中国的符号学研究的任务是双向的,即促进中国符号学现代化和促进中外符号学理论交流,并继而丰富世界符号学的理论构成。也就是说,中国符号学界的任务将不会仅仅满足于发展本国符号学传统;作为世界一分子,其任务还将包括参与人类共同的符号学建设,“中国人已经成功地在世界科技领域积极参与人类知识创造,中国人更应有资格在本民族历史上原本擅长的人文领域中对全人类作出创造性的贡献”(李幼蒸 2001:50)。

最后,创建适合东方思想的“合治”观。西方现代符号学看似流派纷繁杂呈,实则归属索绪尔符号学和皮尔斯符号学两大派别。前者与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思潮相近,以康德先验主义哲学和结构主义思想为基础,其突出特点是人本主义倾向和社会交流性,符号学的主旨在于意指和交流;后者与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接近,以实用主义哲学、范畴论和逻辑学为基础,其突出特点是科学主义倾向、经验主义、生物行为主义、认知性和互动性,符号学的主旨在于认知和思维(郭鸿 2008:41-55)。中国符号学学者在多样化的符号学观念面前往往彷徨不定,对两大流派也多是偏执于一端,这对确立中国符号学的独立地位是不利的。我们认为,西方现代符号学秉承的是“分治”观,即一种坚守符号纯正边界的极性思维,一种符号的性质是建立在对异质符号的否定来实现自身价值的。中华文化的特质则需要一种“合治”的符号学学术观,借此可以彰显中国符号学的主体尊严和人文精神。“合治”观是中国学者应该选择的第三条符号学路线,它并不是对西方两大学派的模糊折中或简单综合,而是一种在汲取西学营养基础上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特点提出的符号意指方式。我们可以用“语象合治”来概括它,具体定义为携带了多种异质符号编码并相互跨界、相互补充的符号或符号表达单位(王铭玉、孟华 2021)。我们的“合治”观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它是相对于“分治”而言的一个对比项,是对异质符号(主要指语象)分治对立关系的解除;其二,它是一种符号化方式,主要包括移心和执中两种类型。这两点构成的“语象合治”符号内涵,既包含了西方的跨媒介、多媒体、多语式、语象叙事的符号学精髓,又吸纳了中国古老的“中和”“意象”“六书”等思想传统,进而形成了具有东方特征的符号学范式,即以“语象合治”为主要原则的“中性符号学”。其核心思想包括:一是在符号本体问题上,坚持以理据性为主,兼顾约定性;二是在符号主、客体关系问题上,坚持以符号主体的“动机理据”为基础,强调主体对客体的阐释力和创造力;三是在研究态度方面,坚持修辞理性和实践理性原则,避开符号学意识形态批判和求真意志的理论冲动,专注于各种符号事物的创意和阐释活动;四是在理论指向方面,坚持语言形式论传统和真值逻辑实用主义传统,即形式化加实体化;五是在思维取向方面,坚持类符号思维加意象性原则。

10. 结语

几十年前语言学与符号学关系微妙,还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语言学家坚信语言学是研究其他学科(含符号学)的典范,是元语言;符号学家固守着符号学方法论,认为符号学是众多问题的解决标准,是范式。但是,在今天,语言学与符号学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互动互融,从系统构建入手,以意指方式为主线,逐渐形成了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语言符号学,受到世界符号学界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推广。在此过程中,中国学者勇于学习和探索,用中国传统的符号学资源不断完善符号学理论体系,引领世界语言符号学的发展,为探索世界符号学的东方之路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 Никитин, М. В. 1997. Предел семиотики [J].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1): 3-14.
 Степанов, Ю. С. 1983. Семиотика [M]. М.: Радуга.
 Степанов, Ю. С. 2001. Методы и принципы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и [M]. М.: Эдиториал УРСС.
 艾柯. 1990. 符号学理论(卢德平译)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苟志效. 2004. 符号学的由来及其发展[A]. 王铭玉、宋尧. 符号语言学[C].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08-113.
 郭鸿. 2008. 现代西方符号学纲要[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何欣. 1999. 索绪尔符号理论对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启示[A]. 语言与符号学在中国的进展[M].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金克木. 1984. 比较文化论集[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卡西尔. 2004. 人论(甘阳译)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乐眉云. 1994. 索绪尔的符号学语言观[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6): 15-18, 26.
 李先煜. 1993. 公孙龙《名实论》中的符号学理论[J]. 哲学研究(6): 62-69.
 李幼蒸. 1999. 理论符号学导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幼蒸. 2001. 略论中国符号学的意义[J]. 哲学研究(3): 47-53.
 莫里斯. 1989. 指号, 语言和行为(罗兰·周易译)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索绪尔. 1996. 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王铭玉. 2004. 语言符号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王铭玉、孟华. 2021. 中国符号学发展的语象合治之路[J]. 当代修辞学(4): 70-85.
 王铭玉等. 2021. 符号学思想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王宁. 1995. 走向文学的符号学研究[J]. 文学自由谈(3): 135-137.
 吴宗济、赵新那. 2002. 赵元任语言文学论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肖峰. 1989. 从哲学看符号[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杨习良. 1993. 修辞符号学[M].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杨 丽)

(下转第 105 页)

Pursuing the Great Harmony in Aesthetic Appreciation: Foreign Literature Education and Chi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Cultivation. by LI Yun & ZHOU Pingdi.

Abstract: How can foreign literature education impose the cultiv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Will it endanger literary autonomy, academic independe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disciplines? These doubts are probably the underlying reasons for the silence of the foreign literary community on the issue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However, we should realize that the Western autonomy theory arises because its limite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limits the ideal of literature to the vast. Chi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n the contrary, contains the consciousness of human community and seeks the Great Harmony of the world,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infinity of the literary ideal. In this regard, foreign literature teaching naturally includes the cultiv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because it stimulates the aesthetic sensus communis and promotes the dialogue between aesthetic and ethical ideals, searching for the ethical foundation of the future human community. In short, it seeks the Great Harmony in aesthetic appreciation.

Key Words: Aesthetic; the Great Harmony; foreign literature; Chi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

(上接第 25 页)

A Review of Linguistic Semiotics. by WANG Mingyu.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semiotics was first proposed by F. de Saussure, which foreshadowed the emergence of this branch of learning. Neither Saussure nor Pierce has made a specialized study of linguistic semiotics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imes and fields. In the world semiotics, there are still no systematic achievements in linguistic semiotics although this issue is occasionally touched upon. It is undoubtedly the series of studies by Chinese scholars that have really played a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building of linguistic semiotics.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semiotics from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perspectives, and sorts out 10 related issues on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review, involving the concept of signs, the origin of semiotics, the debate between nominalism and realism, the boundary of semiotic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linguistics and semiotics, the research object of linguistic semiotics, the prominent features of linguistic semiotics, the basic construction of linguistic semiotics, the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 semiotics and the rise of the fourth realm of semiotics. Linguistic semiotics is a rising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which aims to study linguistic signs and linguistics with semiotic methods. It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for a long time and still requires our thorough exploration and preservation.

Key Words: Linguistics; Semiotics; Linguistic semiotics